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鹏,张春长.楚武王伐随路线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8(1):67-75.

楚武王伐随路线考

王鹏 张春长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楚武王伐随是楚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春秋早期楚的势力范围在汉水中游以西的蛮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而随国的疆域范围在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一带。楚伐随的基本进军线路为先渡汉水,再穿越大洪山地区的河谷地带进抵随国边境,故《左传》所记“瑕”“速杞”等与楚随战争相关的地点可能都在今枣阳西南部一带。楚随战争对双方历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楚国一跃成为南方第一强国,而随国则元气大伤,国势日衰,逐渐沦为楚之附庸。

关键词:楚武王伐随;进军路线;郢都;曾国疆域

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5)01-0067-09

楚之崛起,为春秋时代的重要事件。楚武王是楚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其“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1](P1908)]的功绩彪炳史册。尤其是武王通过三征随国,使楚一跃成为南方第一强国,为此后楚人“越汉水、出方城、逐鹿淮泗”扫清了障碍。但目前学界似对楚武王伐随事件关注不够^①,许多问题亟待澄清,如“瑕”“速杞”等地位于何处?当时的楚都和随都分别在什么地方?两国的疆域范围有多大?楚武王伐随时的进军路线是怎样的?本文结合传世典籍与考古发现,对这些问题试作讨论,以求正于方家。

一、武王伐随前楚国的都城及疆域

关于楚武王时期的都城,传世文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贲立,始都郢。”^[2](P1695)]《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沔水》也认为楚文王徙郢^{[3](P1566),[4](P642)]},则武王时期都城在旧都丹阳。二是《世本·居篇》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

郢。”^[5](P350)]西晋杜预亦主其说^[6](P173)]。长期以来,学界围绕这两说进行激烈争论,聚讼不休。清华简《楚居》的出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契机。《楚居》云:“至武王禽噩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涅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日郢。”^[7](P181)]其明确记载武王始都郢,此郢名为“疆郢”。《楚居》公布后,多数学者已采信“武王徙郢说”。

春秋时期的楚郢都,传统看法多认为在今江陵纪南城。如《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2](P3267)]《左传·桓公二年》杜注:“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8](P73)]石泉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并结合当时的考古发现认为:“春秋、战国的楚郢都及秦汉江陵城应在当时的沮漳二水间(今蛮河流域下游)、汉水以西不远处。今楚皇城遗址应即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江陵城故迹。”^[9](P435)]近年来,尹弘兵、笪浩波等学者认为相比于楚皇城遗址,同在蛮河流域的宜城郭家岗遗址更有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楚郢都。^{[10](P225~251),[11]}尹弘兵

收稿日期:2024-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河北行唐故郡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20&ZD258)

第一作者简介:王鹏(1993—),男,湖北天门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商周考古与先秦史研究。

① 目前似只有陈元秋和姜敏琦论述过楚武王伐随的进军路线问题,笔者认为她们的观点均值得商榷。分别见陈元秋《春秋时期楚国扩张线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姜敏琦《楚武王伐随路线考证》,《炎黄地理》2021年第1期。

认为,春秋郢都反映在考古学上可能是由大量聚落遗址和墓葬构成的聚落群,是当时楚国的核心区域,而郢都是这一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就多年的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来看,今湖北省西部与楚文化探索有关的东周聚落群主要有三处:一是沮漳河下游,以江陵纪南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二是沮漳河中游,以当阳季家湖古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三是蛮河流域,以楚皇城、郭家岗等遗址为代表的东周聚落群。结合春秋时期的楚国史实及出土遗物来看,楚国当时的核心区域最有可能位于蛮河流域^{[10](P237~239)}。我们认为尹先生的看法可从。楚武王始都之“郢”,也就是清华简《楚居》所记之“疆郢”,应在今汉水中游的宜城、南漳一带。

那么,楚武王伐随前楚国的疆域有多大呢?《左传·桓公六年》载楚武王侵随时,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1](P118~119)} 据此可知当时楚国的势力范围在汉水以西地区。《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楚令尹子常“城郢”,大夫沈尹戌说:“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杜注:“方百里为一同,言未满一圻。”^{[1](P1610)} 似楚武王时期楚国的疆域方圆不过百里。但前述楚武王侵随时,随国联合汉东众小国共同抗楚,显然此时楚国的军事实力强于随国。西周晚期楚国已在汉水以西的古沮、漳河(今蛮河流域)一带立足,此后陆续吞并了一批蛮夷部落并灭掉了姬姓邾国^{[12](P4,31~37)}。清华简《楚居》载:“若敖畬仪徙居郢。”^{[7](P181)} 这说明若敖之前楚国已吞并郢国。蚡冒时期“始启濮”^①,“服陜隰”^②。《左传·桓公二年》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1](P97)} 以上记载表明楚武王伐随前楚国的疆域不会太小,否则不可能让汉东诸国甚至中原的蔡、郑都感到惧怕。那么该如何理解《昭公二十三年》所载的“土不过同”呢?孔颖达认为:“言田虽至九百里,犹止名‘同’,故云‘土不过同’,非谓百里以下也。”^{[6](P1657)} 孔氏的观点可从。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楚武王伐随前楚之疆域应

在汉水中游以西的宜城、南漳一带,核心区域是蛮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郭家岗遗址或是春秋时期的楚郢都。

二、武王伐随前随国的都城及疆域

文献记载楚武王曾经三次伐随,这个“随国”即位于随枣走廊之曾国,两者是“一国两名”的关系。楚武王活动于春秋早期,关于这一时期随(曾)国的都城所在,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石泉、黄凤春等学者根据《左传·庄公四年》的记载,结合安居的考古调查资料认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都城在临近淝水的随州安居遗址^{[9](P75~94),[13]};二是陈千万、张昌平等学者根据枣阳郭家庙墓地发掘资料认为两周之际曾国的政治中心在滚河流域的吴店郭家庙一带^{[14](P336),[15](P342~343)};三是方勤亦认为滚河流域的郭家庙一带是两周之际曾国的政治中心,周台遗址(含忠义寨城址)可能是郭家庙墓地同期的曾国都城,但同时认为因楚武王伐随(曾),春秋早期曾国的政治中心曾被迫从郭家庙一带短暂迁徙至京山苏家垄遗址^{[16](P97~112)}。由此可知,目前学界认为疑似春秋早期的曾都主要有三处:随州安居遗址、枣阳周台遗址(含忠义寨城址)、京山苏家垄遗址。

楚武王之前的随国,史籍无载,但根据《左传·桓公六年》“汉东之国,随为大”^{[1](P119)}的表述,我们推测在遭受强楚入侵之前,随国政治平稳,国力较强盛,故此时的都城规模或许不小。随州安居遗址^{[17],[18]}、枣阳周台遗址(含忠义寨城址)^{[19](P34~101)}、京山苏家垄遗址^{[20],[21]}的基本情况,相关简报和研究已有论述,不再赘言。胡刚综合枣阳郭家庙墓地、京山苏家垄墓地、随州枣树林墓地等发掘资料认为:“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的显著特点是以带斜坡墓道的墓葬为核心,实行车马分葬。”^[22]目前,随州安居和京山苏家垄均未发现带斜坡墓道的墓葬,可见安居桃花坡墓和京山苏家垄墓非春秋早期的曾侯墓。根据“生居死葬”的观念,诸侯墓地通常都靠近国都,则随州安居遗址和京山苏家垄遗址可能皆非曾都(关于《左传·庄公四年》的记载,后文再论述)。那么,春秋早期的曾都应在枣阳郭家庙一带,

① 《国语·郑语》载:“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见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77页。

② 《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彼骄我怒,而后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陜隰也。”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676页。

周台遗址(含忠义寨城址)可能是其所在。

关于春秋早期曾国的疆域问题,张昌平认为:“曾国的西部地区包括枣阳中南部的滚水地区,南部地区包括京山北部的漳河上游谷地,中部地区包括涑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东部疆域不明。”^{[15](P331~338)} 黄凤春认为:“西北可至河南新野一带,北沿桐柏山南麓,南沿大洪山北麓,迤东至广水市东南杨寨镇;域括新野南部、枣阳东北部、京山东北部、随州全境、广水市的大部、安陆市的北部及孝昌小部分。”^[13] 黄尚明认为:“西部地区达枣阳的滚河流域,南部发展到京山县的漳河上游,北境以桐柏山为界,达河南新野一带,东部疆域可能与安陆的郢国相邻。”^{[23](P132~152)} 由此可见,对于春秋早期曾国的疆域问题尤其是其北疆范围,学者们是有分歧的。

张昌平认为,应该根据曾国青铜器材料来判断曾国的疆域范围,而判断曾国疆域范围,最重要的是首先需确定铜器群是否为曾国青铜器,再由此分析该器群出土地点是否属于曾国疆域,最后判断临近区域出土的青铜器的性质及疆域问题。^{[15](P332)} 我们认为张先生以曾国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来推定曾国的疆域范围,这一思路是最为科学的。只是因是著出版较早,近些年的许多新材料未及收录,故结论有所局限。下面我们循此思路对曾国疆域范围进行补充论证。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属于两周之际的曾国墓葬或遗址主要有:枣阳熊集段营墓^[24],枣阳吴店郭家庙墓地及周台遗址(含忠义寨城址),京山苏家垄墓地及遗址、檀梨树岗墓^{[25](P207~219)},均川熊家老湾墓^[26],安居桃花坡墓^[27],随州城区义地岗墓地^①,万店周家岗墓^[28],何店何家台墓^[29]等。另外,襄阳太平店、京山城关西北台、随州三里岗尚店、新野小西关、河南桐柏、广水吴店等也发现过曾国铜器或疑似曾国的青铜器群,这些地点的铜器或墓葬需判断铜器性质及疆域问题。襄阳太平店和河南桐柏只出土过单件曾器,且出土地点不明,应从张昌平之说,排除其作为曾国疆域的可能性^{[15](P333,336)}。

随州三里岗尚店 1974 年曾出土过 1 件郢公汤鼎和 2 件郢公伯簋,铜器出土地点已被推平,相关信息丢失。黄敬刚认为,器型和花纹特征与湖北京山出土的铜器相近,表明此地是古代曾国活动的地域,尚店出土的“郢公汤”与“郢公伯”应属曾国的贵族^{[29],[30]}。

张昌平亦认同三里岗所出铜器与曾国青铜器特征相同,但他认为郢公司可能是僻处于曾国之侧的一个小国,其文化深受曾国影响,而三里岗一带可能并非曾国地域^{[15](P335~336)}。从地形图上看,三里岗位于苏家垄墓地所在的坪坝镇的东北方,二者同处于大洪山北麓的漳河上游河谷地带。既然曾国的势力范围能到达漳河上游地区,且三里岗所出铜器又与曾国铜器特征一致,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春秋早期三里岗一带亦是曾国地域。与三里岗尚店类似,1987 年在广水吴店的一座土坑竖穴墓中发现了 11 件铜器,计有鼎 2、鬲 2、甗 1、簋 2、壶 2、盘 1、匜 1,另外还发现玉器、陶器各 1 件,时代属于两周之际^[31]。吴店墓出土铜器与同时期曾国青铜器特征亦相同,从后来广水巷子口遗址的位置来看,吴店一带春秋早期当属曾国疆域。

曾国的北疆范围能否及于河南新野一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1971 年新野小西关发现一座古墓,出土青铜礼器 8 件,仅铜甗上有铭文,即曾子仲諝甗^[32]。曾子仲諝所作之鼎又见于枣阳熊集段营墓,时代为两周之际。黄锦前、姜维认为枣阳熊集段营的墓主为曾子仲諝,小西关墓葬系其子辈夫妇合葬墓。结合近年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来看,新野一带在周初曾国始封时即为其疆域范围^[33]。但张昌平认为曾子仲諝甗的年代早于代表墓葬年代的簋等铜器,因此小西关墓主不可能为曾子仲諝,且小西关位于唐白河流域,与汉水流域的襄阳联系不便,两周之际前后中间可能隔有邓、郢、楚诸国,故新野小西关一带不可能作为曾国疆域^{[15](P336)}。我们认为,不管是段营墓还是小西关墓葬,均只出土一件有铭曾器,据此来断定两墓中谁为曾子仲諝之墓,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偶然性,且新野一带未闻再发现过曾国墓葬。谨慎起见,暂从张说,不将新野小西关一带视为曾国疆域。

京山城关西北台 1980 年曾出土鼎、方缶、盘等青铜器^[34],从铜器特征上看,应属两周之际的曾国青铜器。由于出土地点不明,且京山城区附近未再发现其他曾国墓葬或遗址,故难以据此判断曾国的南疆范围是否已达京山城区一带,谨慎起见,亦不将这个方视为曾国疆域。

综上所述,可见目前属于春秋早期曾国墓葬或遗址的地点约有 10 个。我们似乎只要以上述 10 个

① 包括八角楼墓、义地岗 M83。分别见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94 年第 2 期。

地点就能大致推定出春秋早期的曾国疆域范围,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西周早期曾、鄂等国共存于今随州地区。到了西周晚期,鄂侯驭方勾结淮夷发动叛乱,周厉王出动西六师、殷八师进行镇压,同时命武公率私徒出击,终于平定了叛乱。学者们普遍认为战后鄂国遗民被迁到南阳夏响铺一带,而鄂国地盘则被邻近的曾国接管,曾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汉东第一大国”。直到春秋早期强楚崛起,由于抗楚战争接连失败,曾国元气大伤,国势日衰。春秋中期以后逐渐沦为楚之附庸,湮灭于史载。从整个曾国史角度来讲,春秋中期以后已沦为附庸的曾国不可能还具有伐灭他国、开疆拓土的能力,故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遭受楚国入侵之前,这一时段应是曾国历史上

国力最强、疆域面积最大之时。那么,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被灭之前发现的所有曾国墓葬及遗址,自然可以视之为曾国固有之地盘。如此,则推定春秋早期的曾国疆域范围应囊括两周之际至战国中期的所有曾国墓葬与遗址。

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被灭之前的曾国墓葬或遗址有:随州城区义地岗墓群^①、擂鼓墩墓地^[35],均川刘家崖墓^[30]、王家台遗址^[36],安居徐家咀墓^[37],万福店狮子湾遗址^[38],潭潭鲢鱼咀墓^[39],广水杨寨巷子口遗址^[40]等。加上春秋早期的遗存,我们就能据此大致推定出楚武王伐随前曾国的疆域范围,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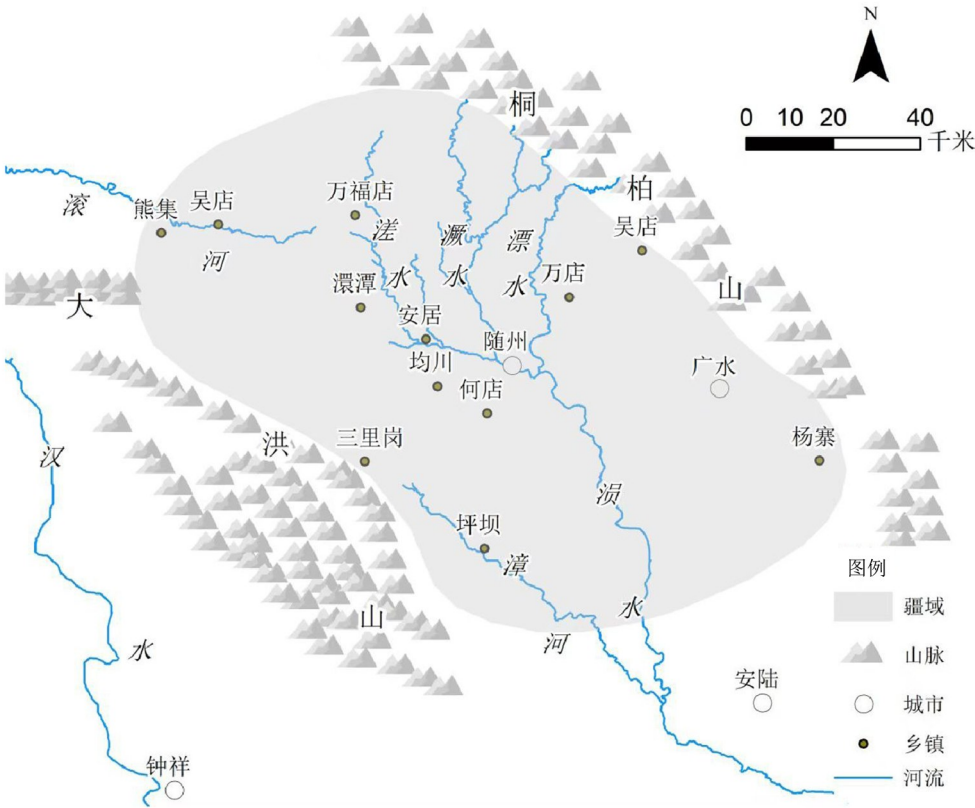


图 1 春秋早期曾国疆域示意图

由上图可知,春秋早期曾国的西部疆域可能在滚河流域的枣阳熊集、吴店一带,东部可达广水河流域的杨寨镇,北疆可能不越桐柏山南麓,南部沿大洪山北麓达漳河上游地区。

三、楚武王伐随路线考

据《左传》等文献所记,楚武王时代曾经三次伐随。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 706 年(楚武王三十五

① 义地岗墓群包括义地岗墓、汉东东路墓、枣树林墓、文峰塔墓等。由于相关简报繁多,这里不再逐一注释。

年),《左传·桓公六年》载: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1](P118~121)}

由“今民馁而君逞欲”可知公元前 706 年随国可能粮食歉收,发生了饥荒。楚武王趁随国民心不稳之机发动了侵随战争。武王驻军于瑕,派薳章入见随侯以“求成”,随侯则命少师到瑕地主持与楚的和谈事宜。和谈的主要内容,《史记·楚世家》云: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2](P1695)}

可见主要是给楚子上尊号的问题,随侯最终答应

了这一请求。但和谈过程中,楚人故意示弱以欺骗少师。少师归来即请求追击楚军,幸亏季梁及时谏阻,才未酿成大错。楚随之间的这一轮交锋至此结束。

瑕,杜注“随地”^{[8](P89)}。《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鄢陵之战后,“楚军还,及瑕”,杨伯峻注:“即桓公六年之瑕……瑕虽随国之地,但随国已极弱小,附庸于楚,只能听任楚国通过。”^{[1](P974)}我们认为其实不必如此迂曲,瑕原本是随地,后来可能因抗楚战争失败被迫割让给了楚国。

对于瑕地的位置,《水经注·阴沟水》云:北肥水又东,积而为陂,谓之瑕陂。陂水又东南径瑕城南,《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师还及瑕。即此城也。^{[4](P532)}认为瑕地在山桑县故城南,即今安徽蒙城县北。江永驳之曰:“楚师自鄢陵还荆州,不当回远由今之蒙城,《水经注》误也。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军于瑕以待之’,当是此瑕邑。盖在今德安。”^{[41](P99)}江说可从。春秋早期楚郢都在汉水以西的宜城平原,而随都在枣阳吴店郭家庙一带。楚武王侵随应先渡过汉水,再穿越大洪山地区的河谷地带进抵随枣走廊,然后便可直扑吴店郭家庙地区。故瑕地可能位于靠近随都的熊集、吴店以西或以南,以今之地图观之,应在枣阳的西南部一带。其进军路线可能如图 2 所示:



图 2 楚武王第一次伐随进军路线示意图

桓公六年楚子以“尊号”问题为借口发动侵随战争,迫使随侯最终答应游说周王。从随侯的立场上讲,随楚两国此前可能已多次交锋,随侯十分清楚楚国早已不是初封之时“子男之田五十里”的实力,故爵位提升似无可厚非,亦可解决眼前的危机。但这一请求被周桓王一口回绝。站在桓王的立场上讲,一个无大功于王朝的蛮夷之君都能随意提升爵位,若诸侯们争相效仿,岂非乱套?这对于致力于整顿王朝秩序,恢复天子权威的周桓王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桓王可能还因此斥责了随侯。随侯无奈,只能将此消息回报楚国。熊通知道后大怒,自立为王,《史记·楚世家》云:

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2](P1695)}

《楚世家》载熊通自立为武王后“与随人盟而去”,其实过程远没有这么平和。《左传·桓公八年》云:

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仇有衅,不可失也。”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蘧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

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1](P131~132)}

桓公八年(前 704),楚国获悉“少师有宠”,认为有隙可乘,于是楚子熊通自立为王,以试探随国及其他诸侯的态度。夏,楚武王在沈鹿召集诸侯举行会盟,随、黄两国未参加。从随国的立场上讲,自立为王意味着从此以后与周天子平起平坐,随国难以认同。况且昭王南行时曾经赐钺授予随(曾)国“用征南方”^①的权力,接受楚子称王便意味着失去“汉阳诸姬”之首的地位,这显然已触犯了随国的底线,故拒绝参会。于是楚武王起兵伐随,驻军于汉、淮之

间。双方在速杞摆开阵势准备决战,大夫季梁先后提出两条破敌之策,均因少师谗言而未被随侯采纳,结果随国被打得大败。随侯侥幸逃脱,少师成为俘虏,被迫与楚签订盟约。

速杞,杜注“随地”^{[8](P98)}。《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云:“传云楚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当在今湖广德安府应山县境”^{[42](P31)},即认为速杞在今广水市境内。此后诸书皆承袭此说,几成定论。对于清人的注释,我们感到十分疑惑。首先,杜注只云“随地”,未说明具体位置,可见至西晋时杜预已弄不清速杞到底位于何处,怎么到了清代突然就知晓其地在今广水,而且所据不明;其次,依是说则交战地点位于楚随二国的东面,距当时两国的都城及核心区域均十分遥远。楚军需先渡汉水,沿大洪山南麓河谷地带涉漳河、逾潞水之后,再行军数百里,方能抵达交战地点。中间至少要经过郢、轸两个国家,且大概率会穿过京山苏家垄遗址所在的曾国南疆势力范围。如此大范围的行军,长途跋涉,穿越多地、多国,是非常危险的。崤之战秦军全军覆没便是鲜活的案例。以楚武王、斗伯比君臣的英明睿智,不太可能犯此兵家大忌。从第一次伐随双方的交锋来看,楚国明显占据上风。楚武王二次伐随属轻车熟路,从常理上讲没有改变行军路线的必要性。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此观点实属谬误。桓公八年的进军路线应与桓公六年差不多,其交战地速杞或与瑕地一样,大概率也在今枣阳的西南部一带。其进军路线可能如图 3 所示。

速杞之战随国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被迫与楚签订盟约,承认了楚子擅自称王的行为。但其实内心不服,等待着时机发动反攻,如《左传·桓公十一年》载:

楚屈瑕将盟贰、轸。郢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1](P140~141)}

此次行动虽不是由随国发起并且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但可一窥随国当时的心态。楚武王可能知悉随之动向,决心于有生之年解决此问题。《史记·楚世家》记载: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2](P1695)}

《左传·庄公四年》载: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

① 原文为“邵王南行,舍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征南方。”见郭长江等《曾公球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20 年第 1 期。

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橘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1](P178~179)

公元前 690 年，周庄王斥责随国“立楚为王”而

事之。楚武王遂以随人“背盟”为借口发动第三次侵随战争。临行前武王身体抱恙，预感大限将至，但仍率兵出征，最终卒于行军途中。令尹斗祁、莫敖屈重秘不发丧，继续领军攻随，兵临随都城下。慑于楚人的强大威势，随侯被迫与楚签订城下之盟，楚遂撤军。



图 3 楚武王第二次伐随进军路线示意图

《左传》云：“除道梁澠，营军临随。”“除道”即开辟道路，“梁澠”即在澠水上修筑桥梁，“营军临随”即构筑营垒，兵临城下。楚军攻随需先渡过澠水，才能抵达随都城下。这说明此时随国的都城已不在枣阳郭家庙所在的滚河流域，而是迁到了澠水以东地区。张昌平认为：“春秋早期前后，楚国连续对曾国一带进行征伐，考虑到当时实施军事打击主要是针对都城进行的，这极有可能也迫使曾国改变其都城位置。”^[15](P342) 枣阳吴店郭家庙一带位于曾国的西疆，靠近楚的势力范围，极易受到楚国的攻击。为避楚之锋芒，随国可能在速杞之战后不久即将都城东迁。安居遗址在 1957 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4 年，经调查后确认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建筑遗

址。遗址位于澠水北岸、澠水东岸交汇处，初步踏查东西宽约 800 米左右，南北长约 1000 米左右。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多处人工台地^[17]。1997 年，运用遥感测量和实地钻探，发现安居遗址有方形夯土城圈，南北长约 190 米，东西宽约 170 米，城址高出地面约 1 米，城墙东、北、西三面保存较为完好。主要遗存时代为春秋时期^[18]。多数学者认为安居古城即是庄公四年楚军“除道梁澠，营军临随”的随都^①。本文亦从之。那么，楚武王第三次伐随的进军路线可能如图 4 所示。

考古勘探显示安居城址堆积较薄，说明该城使用时间可能不长。随国可能在战后不久即再次徙都。从当时的局势上讲，速杞之战失败后随国将都城迁到安居一带，应是想凭借澠水之险抵抗楚国的

① 最早考证出随都在安居的是石泉先生，安居古城发现后更加印证了石先生观点的正确性，此后多数学者亦从之。见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75~94 页。

入侵。但事实证明徒劳无功,楚军可能避开了随国重兵把守的地区,而以“除道”的方式渡过澧水,直抵随都城下。这说明随国防线出现了漏洞,以安居古城作都城仍可能遭受楚的直接攻击,极不安全,故被迫再次迁都。胡刚认为:“从枣阳郭家庙墓地到随州枣树林墓地,共发现了十座曾国国君及夫人墓葬,分别是 GM21(曾伯雱)与 GM52(曾伯雱夫人)、GM17(曾侯夫人)、CM1(曾侯絳白)与 CM2(曾侯絳白夫人)、枣树林 M190(曾公隰)与枣树林 M191(曾公隰

夫人半渔)、枣树林 M168(曾侯宝)与枣树林 M169(曾侯宝夫人半加)、枣树林 M129(曾公德)。以上曾侯及曾侯夫人墓,下葬年代从两周之际延续至春秋中期,中间应没有较大缺环。”^[22]若胡先生的观点不误,根据诸侯墓地靠近国都的一般规律,那么随(曾)国应是迁都城到了枣树林墓地所在的今随州市区一带。果如此,则可推测出公元前 690 年在位的随侯即是埋入枣树林墓地的第一位曾国国君——曾公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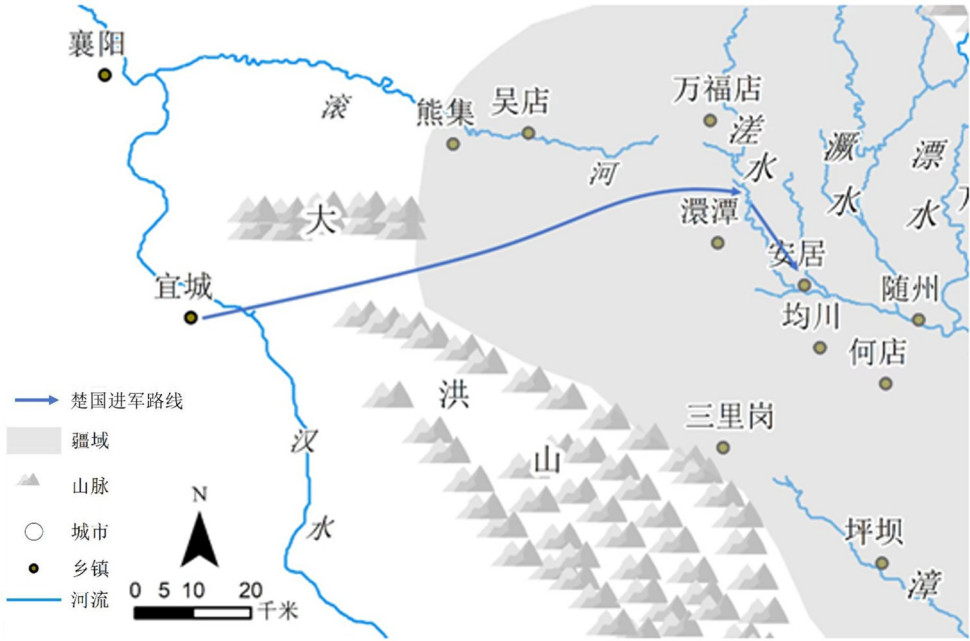


图 4 楚武王第三次伐随进军路线示意图

四、结语

楚武王伐随是楚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春秋早期楚的势力范围在汉水中游以西的宜城、南漳一带,核心区域是蛮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而随国的疆域范围在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一带。楚伐随的基本进军线路为先渡汉水,再穿越大洪山地区的河谷地带进抵随国边境,故《左传》所记“瑕”“速杞”等与楚随战争相关的地点可能都在今枣阳西南部一带。楚随战争对双方历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于楚而言,通过征服“汉阳诸姬”之首的随国,楚国一跃成为南方第一强国,为此后“越汉水、出方城、逐鹿淮泗”扫清了障碍。对随国来说,抗楚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家元气大伤,国势日衰,不得不屈服于楚之威势而逐渐沦为附庸。从“尊周”到“服楚”的转变并非心甘情愿,只是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奈之选,而这一外交转向

使得随国在东周乱世中存续达三百年之久。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陈桥驿.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宋衷,注.世本八种[M].秦嘉谟,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

[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

[8]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尹弘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11]笄浩波.多维视野下的春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清华简《楚居》之楚王居地考[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4).

[12]何浩.楚灭国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

[13]黄凤春.关于曾国的政治中心及其变迁问题[J].中原文化研究,2018(4).

[14]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5]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6]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7]武汉大学荆楚史地与考古教研室.随州安居遗址初次调查报告[J].江汉考古,1984(4).

[18]张昌平.安居周代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N].中国文物报,1998-08-26.

[19]襄樊市考古队,等.襄樊考古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J].江汉考古,2017(6).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 2018 年考古收获[J].江汉考古,2019(6).

[22]胡刚.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侯墓略论[J].江汉考古,2024(1).

[23]黄尚明.曾国历史文化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2023.

[24]杨权喜.湖北枣阳发现曾国墓葬[J].考古,1975(4).

[25]杨权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兼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A].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6]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J].文物,1973(5).

[27]黄敬刚.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J].文物,1982(12).

[28]王世振.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J].考古,1984(6).

[29]黄敬刚.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J].考古,1982(2).

[30]黄敬刚.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J].考古,1982(2).

[31]张学武.湖北应山吴店古墓葬清理简报[J].文物,1989(3).

[32]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J].文物,1973(5).

[33]黄锦前,姜维.新野小西关与枣阳段营春秋墓的年代、国属及墓主[J].四川文物,2019(5).

[34]熊学兵.京山发现一批西周铜器[J].江汉考古,1983(1).

[35]张昌平.湖北随州市擂鼓墩墓群的勘察与试掘[J].考古,2003(9).

[36]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王家台遗址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1(3).

[37]左德田.湖北随州市安居镇发现春秋曾国墓[J].江汉考古,1990(1).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县狮子湾遗址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8(4).

[39]程欣人.随县汲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J].江汉考古,1980(1).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广水巷子口遗址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8(1).

[41]江永.春秋地理考实[A].贾贵荣,宋志英,辑.春秋战国史研究文献丛刊:第 4 册[C].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42]王昉炳,等.钦定春秋传说汇纂[A].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 44 册[C].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85.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Research on the March Route of Chu Wuwang Attacked the State of Sui

Wang Peng Zhang Chunch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0)

Abstract: The conquest of Chu Wuwang attacked the State of Sui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rise of the state of Chu.In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Chu was mainly in the Hanyang River basin in the west of the Han River,while the territory of Sui was located in the Suizao Corridor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Han River.The basic route of the Chu army’s advance to conquer Sui was to first cross the Han River and then cross the valley area of the Dahongshan Mountains to reach the border of Sui. Therefore,the locations related to the war between Chu and Sui recorded in the *Zuo Zhuan*,such as Xia and Suqi,should all be in the southwestern area of Zaoyang today.The war between Chu and Sui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both countries.Chu became the dominant power in the south and Sui was seriously weakened,and its power gradually declined,eventually becoming a vassal state of Chu.

Keywords: Chu Wuwang attacked the State of Sui;the route of his advance; the capital city of Ying; the territory of Zeng State